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4.03.015

数智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机遇、挑战与进路

郭 红、马兰兰

摘要:数智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时空场域、交互方式、内容供给、治理变革等维度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与此同时,数智技术所带来的个性化算法推荐、娱乐化叙事方式、圈群化生存处境、数字化虚拟身份使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引领力被淡化、主导力被离散、传播力被削弱、约束力被消解。因此,本文就如何最大化发挥数智技术的优势,从价值引领、传播优化、素养提升、法律规范等角度提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创新发展路径。

关键词:大学生;数智时代;主流意识形态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1; D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4)03-0122-07

收稿日期: 2024-04-08

基金项目:四川网络文化研究中心 2023 年度课题 "网络舆情视阈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研究"(项目编号:WLWH23-6);四川省教育厅 2023 年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 "网络舆情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项目编号:CJWSZ23-21)。

作者简介: 郭红(1990—), 女(藏族), 四川汶川人, 成都理工大学产业技术学院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E-mail: 475165322@qq.com; 马兰兰(2002—), 女(侗族), 湖北恩施人, 成都理工大学产业技术学院学生, 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与人力资源管理。

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全媒体等数智技术快速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数据爆炸、信息泛滥、网络舆情等为当代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生力量,牢固大学生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加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对党和国家至关重要。数智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中如何充分运用科技的各项优势和协同多方教育主体的创新力量,对驱动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大学生凝聚在党的周围具有深远意义。

一、数智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机遇

(一) 数智技术构筑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跨时空新场域

数智技术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融合发展推动传统意识形态教育范式转化,运用三维显示技术、传感交互技术、立体音频技术等虚拟媒介技术,开发线上课程、虚拟现实、网络媒体等新兴教育工具,推动教育主体和大学生进行跨界交流和互动体验,形成虚实结合的交互式教育新场域。首先,数智技术挣脱了时间"束缚"。现实场域中大学生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受固定时间的限制,简单来说就是"一次性"的教育实践活动。而数智技术的融入打破了传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时间枷锁,为当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一个全时段、可回溯、可重构的教育场域,教育主客体可以随时进入网络空间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活动。其次,数智技术突破了空间"禁锢"。传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受特定现实空间的限制,教育的主客体只能以身体在场的方式参与教育活动中,地理距离、空间阻隔等因素束缚了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范围。而数智时代互联网构建起一个虚拟的、抽象的、流动的社会化空间格局口,主客体在虚拟抽象的网络空间也能参与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实践场域中,通过教育网站、移动客户端、小程序等传播媒介展开线上学习,借助传感交互器等智能设备和计算机仿真技术感受周遭信息资源,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远程化和沉浸化教育。

(二) 数智技术促成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主客体多元交互

数智技术突破了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传统意义上的主客体身份界限,重新塑造了教育主体与大学生的交互方式。"你说我听"式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模式被数智技术所弱化,单向的传播效用逐渐被技术力量消解。数智技术赋能视域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主客体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多向互动、叠加互动的关系。首先,数智技术塑造的去中心化、直接式信息传播方式打破了高校类别、师生身份、学历背景的阻隔,使教育主体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呈现出一种自愿平等、双向互动的关系,主体自愿提供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资源,而客体可以平等获取信息和互动的机会。其次,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使得意识形态教育主客体的交往互动呈现出开放性与自由性,在开放而自由的交往互动中,不仅存在着多个主体与多个客体交往互动、交相作用的情况,也存在着主体与主体之间、客体与客体之间交往互动、交相作用的情况。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主体传播主流思想观念可通过线上授课、发布网络教学任务、建立主题讨论区等方式实施教育活动,大学生利用网络社交平台可以表达新的认识和问题、参与话题讨论,与多个教育主体进行互动,接受来自多方主客体的质疑。进一步地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主客体之间存在共时性的叠加互动关系。教育主体不仅有原创主体,还有宣发主体、解读主体等主体身份,他们共同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主体,大学生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是一个层层叠加、推广、发力的过程,充分理解并运用叠加互动关系,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才能层层深入,产生实效。

(三) 数智技术推动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内容精准供给

数智技术推动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向着精准化、定制化方向迈进。身处数智时代的每个大学 生都处于个性化、差异化的数智环境中,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方式、程度、范围各不相同,数智技 术协助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在精准需求导向的基础上实现精准供给。一方面,数智技术能够精准研判大学 生思想观念和行为倾向。数智媒体通过大数据分析、算法推送等技术可以对大学生相关的热门话题、流 量数据、浏览习惯等信息进行动态抓取、梳理整合和深入分析,描绘出每个大学生的内在动机和行为倾向,进一步了解不同大学生的认知水平、价值取向、思想成熟度等,帮助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主体对学生的意识形态实际情况进行提前研判,为主流意识形态危机预警提供支持。另一方面,数智技术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更具专门化和针对性。依托数据处理和智能分析能力,数智媒体通过对大学生在网络平台上的浏览记录、检索历史等信息进行整合,分析不同大学生的注意力关注点、阅读习惯偏好、心理健康状况等,自动识别、定制、推荐符合其喜好或缓解其压力的传播内容,帮助大学生从主流话语传播中实现焦虑纾解、情感寄托和价值满足,实现针对性精准传播不仅提高大学生的接受度,还能够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

(四) 数智技术实现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治理深层变革

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工作伴随数智技术的蓬勃发展而日益贴近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也愈发能够与大学生的情感产生共鸣,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主体借助技术优势推动教育融合创新、驱动教育协同治理、支持教育深层变革。第一,数智技术驱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协同治理。数智技术以其独特的数据处理能力和智能化特点,促进高校和主流媒体精准地分析大学生在社交平台的舆情,实现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监管,建立健全舆情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通过构建智能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管理系统,数智技术实现教育资源全面评估和高效配置,提高管理的效率和质量,整合教育系统内外的资源形成教育合力。第二,数智技术支持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深层变革。依托算法算力技术和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者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方法、途径、要求等进行深入剖析并形成总结性结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主体在此基础上改进教育活动,选择适合的教育方法精准浇灌大学生。同时,教育主体利用数智技术的流程再造、视觉生产和数字拟像技术,可建构理论学习、视听学习和讨论学习等多个区域,大学生不仅能在生动、形象、具体的学习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内容,而且能在"身"与"心"的同步认知中领略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真谛。

二、数智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多重挑战

(一)"个性化"算法推荐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

算法推荐受到资本逻辑和商业利益的影响,其开发团队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应用前景具有特定的价值导向。算法推荐蕴含意识形态功能属性,产生的负向效应耗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甚至引导操控大学生的价值主张和认知判断,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其一,"个性化"信息传播压制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网络媒体平台在算法推荐技术的加持下信息推送能力不断强化,"个性化"信息传播极大地提高了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效度和满意度。大学生更倾向于关注与自己兴趣相符的信息增强了他们在各网络平台媒体用户的黏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思想意识薄弱的大学生将具有理性、深刻与政治性的主流意识形态视为"异见"。其二,被操控的算法推荐侵蚀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算法推送常被暗处的资本主义或者其他不良势力而渗透,以更加隐蔽的手段,如打着学术交流的幌子,裹挟着政治图谋,以线上讲座等形式不断渗透其价值观念,在不自觉中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判断与选择。大学生长期沉浸在被算法操纵传播各种反崇高、反理性的信息空间之中,其思维变得狭隘,认知被恶意蒙蔽,容易掉入误导性的意识形态陷阱中,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大学生的共识凝聚作用和价值引导作用。

(二)"娱乐化"叙事方式离散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力

"娱乐化"叙事往往强调个体的心理体验和情绪表达以满足大学生的感性需求,而较少涉及宏观的、深层的社会思考和价值判断。这种叙事方式使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距离感,反感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和理论厚重的话语表达。"娱乐化"叙事方式在大学生精神需求中占主要位势时,强调理性、崇高和责任等元素的主流意识形态被置于边缘化境地,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受到了冲击和稀释。其一,图像娱乐化方式冲散主流意识形态主题性。自媒体中的图像叙事方式往往追求轻松、幽默、娱乐的效果,关注浅显表达的娱乐化图像既让大学生丧失本真,盲目追求图像宣传中的自由和极致,又使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主题的深度思考和理解减少,使主流话语逐渐让位于娱乐话题。这种片面强调图像呈现效果的娱乐化方式,将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引致重形式、缺逻辑的泛娱乐主义困境,消融主流意识形态本真内容所蕴含的主题性和逻辑性。其二,"娱乐化"叙事方式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泛娱乐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产物,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反传统、反权威的思维方式,排斥政治逻辑的宏大叙事,以碎片化的叙事表达形成对中心权威的质疑和破坏。这种娱乐化叙事方式将主流意识形态简化为一些轻松有趣的符号或形象传达给大学生,导致大学生对其真正含义产生误解或忽视,难以形成系统性和深度性的理解。当严肃的政治、历史、文化等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内容被"碎片化"剪切,并将糅杂成一个"娱乐化"作品,或者采用蒙太奇式谎言的叙事方式编造高热度的故事情节,大学生可能会对严肃话题产生忽视和淡化的态度,从而削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尊重和认同,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三)"圈群化"生存处境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

网络圈群自带的过滤和筛除功能导致信息的封闭性和狭隘性,将异质人员与信息排除在外,使得圈群内的信息传播变得高度同质化,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传播壁垒、内容掩蔽和群体极化等话语表达问题,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受到阻碍,难以充分发挥其主导性。首先,"茧房效应"裹紧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壁垒。"茧房效应"是人们在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将自己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茧房效应"不断挤占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场域,加剧大学生社会意识分化和认同危机。网络空间中大量的同质信息反复推送给大学生,使其处于封闭的"回音室效应",在思想上形成高度的"自我封闭"壁垒。当不同圈群的大学生都只关注符合自己兴趣的信息时,无疑会加剧各圈群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大学生因此无法全面理解和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和思想,逐渐丧失了主动接触主流意识形态的动力。其次,"群体极化"加剧主流意识形态人圈困境。"群体极化"对于意识形态的冲击既包括直接的常态对抗,即直接宣传错误思想,也包括特定时间点消极对抗,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恶意挑起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的。圈群内的信息传播往往具有高度的互动性和即时性,群体成员在情感聚集和群体认同的作用下,极端情绪易产生并强化原有的观点。大学生面对网络舆论往往倾向于情感判断和圈内典型意见,群体内的极端观点使其对理性话语产生误解或偏见,排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因此主流意识形态权威失落并产生应急风险。

(四)"数字化"虚拟身份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力

数字媒体借助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为现实空间的人构筑了网络社交空间,数字化技术既参与人类认知的建构,又嵌入社会制度的日常运行中,深刻影响着人们与世界交互的内容与方式。 无法忽视的是数字化技术带给大学生交往便利的同时也为大学生赋予了虚拟社群中的虚拟身份,虚拟身 份为突破主流意识形态约束提供了助力。首先,"去抑制"效应消解责任和伦理意识。"去抑制"效应的表现结果是个体的行为和情感表达不再有任何外在的约束和内在的监督。虚拟身份的存在意味着信息内容和信息发送者被剥离,责任意识和信赖前提也同时被剥离。大学生在交互过程中不用再顾忌言语,出现了如虚假消息、舆情讨论以及侵犯他人隐私等现象,造成了网络社交的无序和混乱,也松懈了大学生对道德规范和法律法规的遵守,这就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约束的效力被削弱。其次,"隐形"身份进犯思想防线。他们利用不被看见的社群或身份发表和讨论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想法和观点,他们突破沉默的螺旋效应进行社会验证以获得社会认同,此时大学生所输出的信息和思想产生了脱离主流意识形态场域的"离心力",突破了主流价值观的约束。

三、数智时代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实践进路

(一) 突出价值引领,推动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智能投放"

"收编"算法推荐,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覆盖面。借助算法的识别、筛选和推荐能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柔性传播效率。要加强"个性化"算法推荐技术的研发,善于捕捉大学生在不同情景下的思想行为模式,通过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技术,训练算法模型以识别和筛选符合主流意识价值供给和大学生情感需求的内容投放。在算法推荐场域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中,要竭力纠正算法技术向工具理性的偏移,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占据主导地位。主流平台要强化算法把关,通过算法推荐系统的权重调试,增加主流意识形态信息的能见度和曝光率,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在算法推荐中的权重占比⁶⁶,提高大学生点击和阅读的可能性。主流媒体应培育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流量池,使更多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价值传播的作品成为"爆款"和"顶流",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覆盖面和导向性。

"驾驭"算法技术,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优质内容投放。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媒体融合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时明确指出: "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在算法推荐分发信息环节,通过设置人机协同的内容审核机制,既充分利用自动化审核工具以提高效率效能,也充分发挥人工价值审核的高品质效果,避免向互联网平台"内容池"中投放错误或有害信息,确保推荐内容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为大学生提供更多正能量和有价值的信息。在算法推荐的评价反馈环节,综合考虑内容质量、用户反馈、社会影响等多方面因素,突出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引领作用,奖励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精神等主题的大学生,培养一批理想信念坚定、价值观念正确、具有创新精神的大学生"意见领袖",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由内而外向大学生传播优质内容。

(二) 改进传播机制, 优化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智慧宣传"

应用多元化叙事方式,提升主流话语宣传吸引力。在进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宣传效果,教育主体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叙事类型。高校针对学生党员要以文字叙事、历史叙事等为主。学生党员大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政治基础,对其进行文字叙事可使他们更好地领悟故事情节背后的深层含义,帮助他们更好地完善自身的理论建构,提升理论水平,努力提升自己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官方媒体可以从大学生的角度出发,契合大学生的浏览习惯,利用图像、视频等视觉元素,通过动画、微电影、纪录片等生活叙事、微观叙事方式进行主流话语的宣传,设置话题讨论、角色扮演、线上问答等互动形式,让大学生在参与中体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刻内涵,更大程度地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大学生队伍

中的吸引力和向心力。

建设高水平教育队伍,健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长效机制。一要选拔任用优秀教育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网信领域高端人才"。面对日趋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内外传播环境,必须建设一支政治立场坚定,兼具智媒体思维和智媒体创意、生产、传播、运营、管理等能力的实践型人才队伍,唯此才能不断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智能传播^们,满足新时代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主体的发展需求。二要加强教育队伍管理和培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设,履行巩固壮大主流思想文化的责任、加强网上舆论工作的责任、强化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的责任、处理好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责任以及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管理和党员干部管理的责任。高校应将意识形态相关理论与数智专业素养纳入教育队伍培养体系,探索培养具备数智专业素养的意识形态教育者,实现理论与技术的有机结合,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教师和学生进行表彰和奖励。

(三) 倡导网络道德, 筑牢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智媒底色"

运用示范警示法,培养大学生自觉遵守网络道德意识。教育主体应加强对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的监控和管理,注重培养大学生对虚拟身份的正确认知,合理使用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在抖音、微博等社交平台发言交流应具有面对面交流的礼貌态度,避免"极性化"表达引发网络矛盾冲突。通过广泛宣传榜样人物的高尚思想、先进事迹、卓越成就等影响大学生的思想、感情和言行,传递主流价值观念、网络道德准则、网络行为规范。严厉打击网络欺诈、恶意攻击、传播谣言等行为,通过反面典型敲打大学生的心灵,给人以警醒、深思和震撼,使大学生明底线、知敬畏,真正做到在思想上敬法畏纪、在行为上遵规守矩。

提升大学生正确应对舆论斗争的媒介素养。新时代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与法制、道德素养等同样重要,媒介素养教育最典型的体现就是网络舆论的应对。高校应该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引导学生了解媒介的种类、特点、运作机制,将培养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应该学会明辨媒介信息的真伪和可靠性,面对网络舆论时保持冷静和理性,不盲目跟风或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大学生应该具备对舆论信息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要学会质疑、分析和评价,不轻易被不良信息和错误思潮所迷惑,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评析自己的观点,避免被大众舆论"牵着鼻子走"。

(四) 完善法律规范, 创设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数智生态"

完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法律制度,使教育做到有法可依。随着数智技术的日益普及,针对互联网领域和网络空间的系列意识形态问题,要进一步加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责任之间边界的研究,将涉及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责任适时引入法律责任之中^[8],确保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监管、审查工作顺利开展,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筑牢法律屏障。要加强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教育的法治宣传,可通过搭建案例分析、法庭模拟、人工智能法律问答等方式,引导大学生明晰网络言论自由、网络安全、网络侵权等方面的内容,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

强化网络传播主体的道德伦理软性约束。当前数智媒体传播的法律法规无法面面俱到地对其内容生产与信息分发进行监管与强制规范。为此,亟须发挥道德伦理的软性约束力,充分激发智能媒体引领正向价值传播的功能,加快构建风清气朗的媒介环境,建立起智能媒体运作的制度规范与基本伦理¹⁹¹。网络

传播行业应建立自律机制,制定行业道德伦理规范,明确网络传播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行业公约中,发挥好智能媒体引领大学生正向价值的传播效能。充分运用社会舆论约束网络传播主体行为,广大网民应积极参与网络空间的监督,对抹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行为进行谴责和举报,形成全社会共同维护网络伦理规范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 [1] 刘爱玲. 互联网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的转换与重构[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6):135-138.
- [2] 骆郁廷.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与客体[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2):1-7.
- [3] 沈正赋,袁华. 阐释与理路:智能媒体场域中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构[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 149-157.
- [4] 张永红,邓晓.智能传播时代泛娱乐主义衍生的意识形态风险与化解[J].理论导刊,2023(11):56-61.
- [5] 崔春梦. 网络交往"信息茧房"的意识形态效应及其治理[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 151-160.
- [6] 张林. 算法推荐场域主流意识形态"能见度"的遮蔽与突围[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23(4):52-60.
- [7] 吴访益,谢东俊. 智媒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机遇、风险与应对[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3(20):107-111.
- [8] 杨云霞,以法治手段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研究[J].湖湘论坛,2024(1):78-86.
- [9] 方正,叶海涛. 智媒时代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三点思索[J]. 理论探索,2020(2):43-48.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Approaches for College Students' Mainstream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Smart Digital Times

GUO Hong, MA Lanlan

Abstract: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provide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patio-temporal field, interaction mode, content supply, and governance reform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personalized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entertaining narrative mode, group survival situation, and digital virtual identity brought about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ve diluted the leading force of mainstream ideolog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discrete the dominant force, weakened the communication power, and dissolved the binding force.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mainstream ideolog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value guidance, communication optimization, literacy improvement, and legal norms on how to maximize the advantages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smart digital times; Mainstream Ideological Education